

# 从“预言家”到“诅咒者”<sup>\* 1</sup>

## ——多丽丝·莱辛的理想主义

刘玉环 周桂君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 130024 / 长春工程学院, 长春 130012;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 130024)

**提 要:** 多丽丝·莱辛理想主义的内涵前后变化很大, 大致以她二战后离开非洲来到英国为界。前期莱辛继承理想、现实二元对立的西方理想主义模式, 她批判种族歧视的丑恶现实, 向往种族平等的理想社会。后期莱辛逐渐对西方理想主义模式产生质疑, 与西方理想主义许诺的美好未来相反, 她在创作中不断想象出比现实更丑恶的未来。莱辛理想主义的转变既与跨文化经历有关, 也与20世纪西方理想主义从盲目乐观走向愤世嫉俗的演变有关。

**关键词:** 多丽丝·莱辛; 理想主义; 预言家; 诅咒者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5-0149-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5.037

### From a Prophet to a Curser: Doris Lessing's Idealism

Liu Yu-huan Zhou Gui-ju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 Changchu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Doris Lessing's idealism,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by the event of her leaving Africa for England after the World War II, shows great changes. In the former period, Lessing inherits Western idealism's pattern which shows binary oppositions between ideality and reality. She criticizes racism and yearns for an ideal society where all men are equal. But in the later period, Lessing begins to question Western idealism's pattern. Contrary to the bright future promised by it, Lessing imagines a future which is even uglier than reality. The change of Lessing's idealism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her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as well as the transition of Western idealism from blind optimism to cynicism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Key words:** Doris Lessing; idealism; prophet; curser

#### 1 引言

根据《牛津高阶英汉词典》,“理想主义”(idealism)的字面意义指“即使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仍相信可以实现完美的生活”。理想主义在西方的历史源远流长,其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以柏拉图的理念说为代表。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完美的,而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摹本,是有缺憾的——这确定西方理想主义理想/现实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随后出现的基督教延续这一模式,“希腊哲学就感觉的世界建设一种理念世界,而基督教则与相对的不完全的现世世界相对立,而建设圆满的、具足的神

的世界”,即“上帝天国”(金子 1926: 4)。整个中世纪,基督教理想主义在西方思想界占主导地位。西方近现代理想主义是对基督教理想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只是立足点逐渐从神转为人,即从期待上帝拯救选民进入“上帝天国”,转为选民拯救自己,拯救全人类,建立“人间天国”。进入20世纪,伴随“上帝死了”的呼声,追求人间天国的理想主义蓬勃发展,在20世纪前期形成各种理想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狂热局面;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十全十美的社会,十全十美的‘国家’,这都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恩格斯 1949: 5),理想主义追求的至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11&ZD136)、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英国二战后社会转型期‘愤怒的青年’文学现象研究”(2016BS59)和吉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多丽丝·莱辛的跨文化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研究”(吉教科文合字 2016 第 316 号)的阶段成果。

的人间天国实际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所以20世纪中后期见证了西方理想主义从狂热走向愤世嫉俗、从理想主义走向伪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与文学正式结缘是以189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创立作为契机。根据诺贝尔遗嘱,诺贝尔文学奖要“授予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富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埃斯普马克2001:7),所以具有理想主义倾向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核心标准。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对自身的理想主义倾向具有清醒认识,在自传中提及自己和父母都是“寻找圣杯的人”(Lessing 1996:7),都是理想主义者。然而,纵观莱辛作品,可以发现一生中,莱辛理想主义的内涵体现出很大变化。从莱辛的半自传小说《暴力的孩子》及自传可以发现,莱辛二战结束从南非来到英国后经历过一次重大的思想转折,可以此为界,将莱辛的理想主义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莱辛是人类美好未来的“预言家”,其半自传5部曲《暴力的孩子》的前4部“体现出不可否定的理想主义倾向”(Linfield 2001:59);后期莱辛则成为人类灾难命运的“诅咒者”,其笔下灰暗的末日景象似乎表明莱辛“不再关心人类,厌倦人间的悲苦”(Leonard 1982)。究其原因,莱辛理想主义的转变既与跨文化经历有关,也与20世纪西方理想主义从狂热走向反面的戏剧性演变有关。

## 2 人类美好未来的“预言家”:莱辛前期的理想主义

前期莱辛是人类美好未来的“预言家”,其理想主义继承西方理想主义理想/现实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当时莱辛生活在南非殖民地,她生活中最突出的不合理现象就是种族歧视,所以其理想主义表现为批判种族歧视的丑恶现实,向往种族平等的理想社会。

面对南非的种族歧视,少年莱辛幻想出种族平等的“金色之城”。实际上,金色之城就是上帝天国的化身。在《暴力的孩子》5部曲的第一部《玛莎·奎斯特》(Martha Quest)开头,玛莎就提及青少年时期熟悉的白日梦,梦中是一座金色之城,有4座城门。莱辛指出,“《玛莎·奎斯特》或多或少是我的自传”(Lessing 1997:13),所以可以将玛莎看做莱辛。在玛莎梦中,各色人种混杂在一起,“北方蓝眼睛白皮肤的孩子正和南方古铜色皮肤深色眼睛的孩子手拉手一起玩,大人们微笑着,赞许地看着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莱辛2008:17)。人人平等、种族和谐的金色之城令人想起宗教圣城耶路撒冷。以色列著名传统歌曲《金色的耶路撒冷》中提到“主必将他的道教训万国万邦,我仿佛看见多国的国民一同前往”,这表明耶路撒冷并不排斥异族人。实际上,从犹太教发展到基督教,选民范围已经扩大到包括信仰上帝的异族人在内,《新

约》多次提到耶稣派彼得等门徒向异族传福音,因为“上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Nelson 2009:1597)。然而在现实中,特别是在南非,种族歧视却普遍存在,种族平等只能是一种天国幻象。小说中,玛莎亲自掌管金色之城的钥匙,她的父母及大部分南非白人因怀有种族偏见而被关在门外,其情形正如“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要难”。可见,与万国之民同聚的耶路撒冷一样,种族平等的金色之城就是上帝天国,对金色之城的向往体现出基督教理想主义对莱辛的影响。

关于莱辛为何具有反种族歧视的理想主义倾向,莱辛说金色之城“一半源于文学,一半源于与之相对的我生活于其中的现实”(Lessing 1994:156)。一方面,金色之城源于西方文学的影响。莱辛在非洲长大,但文化之根却在西方。莱辛家中有很多文学经典,她通过阅读大量西方文学作品了解西方文化,了解西方理想主义模式。同时,西方文学也为莱辛的理想主义注入反种族歧视的内涵。对莱辛影响最大的是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对社会现实、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感染了莱辛,使她敢于揭露丑恶现实,批判种族歧视。莱辛也深受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在他们对现代社会人类混乱感情的绝望陈述中体会到对全人类的极度怜悯,从而能够跨越种族界限,滋生对南非黑人的同情。此外,莱辛称自己为“文学养大的孩子”,因为她只接受过几年教育,之后便因眼疾辍学,通过博览群书进行自我教育。这使莱辛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南非白人学校的种族思想灌输,从而能够超越种族界限,反观南非白人。当父亲醉心于殖民宣传的小册子,相信“上帝亲命英国人通过大英帝国统治全世界”时(同上:191),莱辛却在阅读《大英帝国的衰落》,清醒认识到殖民帝国必将灭亡;与之相比,她那接受昂贵教育的弟弟就像小婴儿,继承了父辈的种族偏见,从不怀疑或批判权威,而莱辛总是“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那个小女孩(同上:17)。

另一方面,莱辛幻想金色之城,也是受南非种族歧视现实的触动。当时,南非白人普遍怀有种族偏见。一提起黑人,白人立刻结成统一战线,他们污蔑黑人“全都是肮脏、龌龊、让人恶心的货色,全都是小偷和骗子”(莱辛2008:329),以便心安理得地剥削黑人,使黑人安于被奴役的命运;同时,就像守财奴总是担心不义之财会被抢走一样,南非白人也担惊受怕,经常幻想“黑鬼会把我们赶进海里”。一位白人富孀竟因此得了分裂症,不得不紧握棍棒,时刻守住大宅,以把幻想出的“黑人劫匪”赶出去。当时莱辛家也雇佣很多黑人劳工,莱辛经常隔着窗子看黑人小孩在烈日下犁地。同龄的白人男孩都在学校读书,而黑人小孩只能世代做奴隶,莱辛对此深感气愤。金色之城的作用就是“像有保护作用的毯子一般包裹住那个极度贫穷、赶着牛犁地的非洲小孩”,“很多很多这样的

小孩”(同上:16)。

然而,金色之城虽好,毕竟是“美人如花隔云端”,怎样才能实现呢?就在莱辛苦苦思索之际,她接触到共产主义,其理想主义从对“上帝天国”金色之城的空想走向对共产主义“人间天国”的践行。莱辛晚年回忆道“我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全都因为当时的时代精神”(Lessing 1994:259)。莱辛出生于1919年,青少年莱辛所处的20世纪前期正是“有人欢呼,有人绝望”的时代:一方面,20世纪前期是“上帝死了”的荒原时代,上帝天国已经坍塌,人类从没有过如此失落;另一方面,20世纪前期也是追求人间天国的理想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人类也从没有过如此自信,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各种理想主义纷纷登场,寻求以自身替代上帝,拯救全人类,建立人间天国。这种理想主义热潮也传到非洲。当时,随着二战临近,一些欧洲难民到非洲避难,英国空军飞行员开始驻扎非洲,他们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通过与他们接触,莱辛得知包括种族歧视在内的所有人类仇恨“全都会随共产主义的到来而消失”(Lessing 2008:154),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国”仿佛就在街角,触手可及,所以莱辛加入共产主义小组。

共产主义继承基督教理想主义模式,罗素认为无产阶级相当于选民,共产主义社会相当于上帝天国(罗素2010:448);莱辛晚年也认识到二者的一致性,“在西方,两千年来我们的想法被基督教所塑造。可怜的人类挣扎在眼泪谷,忍受痛苦,但会被救世主所拯救,救世主可以是基督、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经受痛苦、困惑,前方就会出现天堂”(Lessing 1994:282)。然而,二者的不同在于:上帝天国位于哈姆雷特尚惧怕的“不可知的死后”,显得虚无缥缈;共产主义人间天国则更具现实性,马克思提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马克思1949:50),也就是建立“人间天国”,正是这种“人需要改变世界”的号召,加上苏联的榜样作用,使20世纪前期追求共产主义人间天国的理想主义运动如火如荼。

因坚信共产主义“人间天国”指日可待,莱辛全身心投入共产主义实践中。她迈出第一步——离开家庭。本来同其他南非白人主妇一样,莱辛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家务有黑人帮忙,每天的活动就是陪丈夫参加舞会。然而,当时南非新一代白人一方面哀叹被未知的文化放逐:殖民地是那么闭塞,欧洲是那么遥远;另一方面,他们又因殖民地而骄傲,因为当时南非白人在全世界生活得最好。由于担心二战会解放黑人,他们规定人们“在这个神圣的圈子里”不许谈论政治。他们装疯卖傻,纵酒狂欢,就像“有许可证的疯子,仿佛没有未来”(莱辛2008:234)。南非白人醉生梦死的殖民生活恰恰是莱辛批判的,她选择离开,就是要改变这丑陋的世界,创造美好未

来,“这样孩子将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那里没有种族仇恨,没有不公正”(同上:262)。得知莱辛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后,母亲与她决裂,朋友纷纷警告她,但莱辛毫不在意。此时苏联成为她的精神支柱,她把自己想象成列宁一样的战士,夜以继日地工作;小组成员全都被未来的景象所鼓舞,彻夜谈论苏联,谈论未来。回忆起这段经历,莱辛写道“我们相信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从没想过我们到底有哪些品质,使我们可能改变整个世界,永远地改变”(同上:300)。实际上,莱辛的理想主义并不是特例,而是20世纪前期世界范围内追求人间天国的狂热理想主义运动的缩影。

由此可见,不管是对金色之城的幻想,还是对共产主义人间天国的践行,前期莱辛都保有理想/现实二元对立的西方理想主义“旧瓶”,只是为其换上时代酿造的反种族主义“新酒”。

### 3 人类灾难命运的“诅咒者”:莱辛后期的理想主义

来到英国后,莱辛逐渐对理想/现实二元对立的西方理想主义模式产生质疑,与西方理想主义许诺的美好未来相反,莱辛在后期创作中不断想象出比现实更丑恶的未来。此时莱辛就像人类命运的“诅咒者”:在她笔下,世界末日的大灾难取代美好未来,毁灭之城遮蔽金色之城。

《暴力的孩子》最后一部《四门城》(*The Four-Gated City*)记录莱辛来到英国后理想主义的变化。“四门城”即有4座城门的“金色之城”,莱辛将其定位在伦敦,因为伦敦是与非洲“黑暗大陆”相对的“光明之邦”,是南非白人梦中的天堂。在小说中,玛莎在南非共产主义小组失败后奔赴伦敦寻找人间天国,然而伦敦不但没成为人间天国,反而遭遇毁灭,这一结局体现出莱辛对西方理想主义模式的质疑。初到伦敦,玛莎结识了作家马克。马克也是理想主义者,得知玛莎在寻找“神话城市”,马克写下小说《大漠深处失落的城市》描写一座“花园城市”的崛起。平沙大漠中,坐落着一座“有喷泉和笛声的城市”(Lessing 1993:153),即玛莎心中辉煌的四门城。花园城市历经衰歇,越来越强大,成为覆盖整个大陆的大帝国。这种对越来越强大的帝国的期待符合英国民众长期以来对大英帝国怀有的理想主义情感,对越来越美好的未来的向往正体现出前期玛莎的理想主义倾向。然而,后来马克却多次要撕毁这个故事,认为它讲的全是谎言,原因就在于他和玛莎亲眼目睹伦敦走向衰亡,甚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都走向毁灭,在这种情况下,许诺美好未来的理想主义只能是谎言。在小说中,灾难的原因是战争:1952年,英国成立波顿秘密武器部,研发军用毒气。一天,秘密武器部失火,毒气随风飘散到英国上空。加上原子弹失事、核武器泄露,此时的英国一派末日景象:动物纷纷死亡,人也

未能幸免;绵延数里的海岸线上,死亡迅速蔓延,传遍全世界。灾难看似危言耸听,但影射的正是当时的现实。莱辛到英国时,二战这一“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已经结束,但世界仍笼罩着战争的阴云,“英国越来越多科研机构开始悄悄从事毒气、化学武器和相关疾病的研究”(同上:63)。在莱辛看来,战争的根源在于人性的缺陷“人心中有某种东西,总倾向于隔离、区分。人们因微小的差异而隔绝得那么彻底,无法交谈,必须时时警惕,处处提防”(同上:92);正是人性的缺陷使人总忙着在他人脸上寻找和自己的不同,结果因差异导致战争,导致毁灭。此时,莱辛笔下再没有光明的未来,唯有灰暗的末日景象,这体现出后期莱辛对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

莱辛的理想主义为何发生转变。首先,这与跨文化过程中的个人理想破灭有关。莱辛指出“我确信父母未实现的梦想和愿望会影响孩子”(Lessing 1994: 186) 莱辛见证父母在非洲的理想破灭,这为其理想主义转变埋下伏笔。莱辛的父母之所以来非洲,是因为从殖民宣传海报得知在非洲种玉米5年就能致富,实际上,这不过是一战后英国政府为安置退伍军人而采取的宣传策略。来非洲前,莱辛的父母满怀梦想:母亲梦想发财,将来回英国保持中产阶级地位;父亲梦想拥有一座英国式农场,过上安逸生活。然而,当时大英帝国已是日暮斜阳,他们到非洲后很快发现:非洲农场既无法让自己一夜暴富,也没有英国农场的舒适和谐,“在偷来的土地上”,白人如孤魂野鬼,种族矛盾一触即发。由于希望落空,母亲垮掉了,在非洲从没有过家的感觉;父亲愤愤不平,直到离世“始终把英国看做对臣民违背诺言的国家”(同上:36)。对父母来说,唯一的希望是子女能回英格兰,“过真正的生活”。所以,莱辛回英国承载的不仅是个人的梦,还有父母的梦。然而,莱辛二战后怀着朝圣者心态来到英国,却失望地发现英国并不是父母描述的“人间天国”。在《四门城》中,以局外人目光审视伦敦,玛莎感到“一切都如此丑陋”(Lessing 1993: 25)。泰晤士河肮脏无比,马路两旁管道线路横七竖八,大名鼎鼎的牛津街不过是一排排破旧的小商铺,立在帽子一样低矮的、灰蒙蒙的天空下。城市令人失望,乡村同样如此。玛莎找到父亲向往的英格兰乡村,那里花香四溢、恬静和谐。然而,距此10英里就是原子弹研制中心,不远处是另一家军工厂。在能够毁灭全世界的武器面前,美好富足的英格兰乡村也永远消失了。在英国,莱辛不但没找到父母的“人间天国”,也没找到个人的“金色之城”。刚下码头时,她平生第一次看到白人干沉重的体力活,立刻自豪地想到自己即将踏入英国这自由、平等的国家。然而,英国的阶级体系很快将她从美梦中惊醒:这里阶级壁垒森严,中产阶级谈到工人阶级好像谈论“月球上的生物”,而工人阶级已把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内化——这令莱辛失望地感叹“英国是两个民族”(Lessing

1997: 35)。同父母初到非洲的情形相似,对英国的失望促使莱辛的理想主义发生转向。

其次,莱辛理想主义的转向还要归因于20世纪中后期西方理想主义从盲目乐观走向愤世嫉俗的时代气氛。由于其移民身份,莱辛很长时期内处于英国社会边缘,她以局外人身份对西方理想主义进行反思,认识到盲目乐观和愤世嫉俗同为西方理想主义的正反面,二者都体现出西方理想主义的狂热,所以后期莱辛“逐渐学会不相信狂热”,其笔下的末日景象是对西方理想主义许诺的美好未来的颠覆。

莱辛刚到伦敦时,英国处于全民理想主义的亢奋状态,其盲目乐观引发莱辛反思。处处体现的鲜明对比令莱辛震惊:一方面是二战后英国千疮百孔的废墟状态,另一方面是英国民众对未来乐观的向往,“每个人都相信一切只能变得更好”(Lessing 1994: 291)。实际上,当时很多国家都出现全民理想主义现象,特别是在前苏联,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在内的很多作家沦陷其中。理想主义原是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的向往,但成为全民理想主义后,就失去对现实的超越性,蜕变为粉饰现实的“伪理想主义谎言”(董晓 2009: 54)。在苏联,全民理想主义催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新政权的盲目神化;在英国,全民理想主义导致民众无视现实,顽固坚持“英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在莱辛看来,这种理想主义“就像某种普遍的愚蠢的象征”(Lessing 1997: 8),因为她以边缘人视角敏锐觉察到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病。回忆那个年代,莱辛写道“我确实看到发生的一切都很丑恶。就好像我是唯一清醒的,而其他人都在做噩梦,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同上:80)。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期待的理想世界无影无踪。其实,从19世纪末开始,英国出现“帝国主义和工人运动并步前进”的历史奇迹(顾准 2013: 100) 20世纪英国民众的理想主义主要建基于两大基石,即海外殖民地支撑的“大英帝国”和国内工人运动许诺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好前景,两大基石的坍塌导致英国民众的理想主义从狂热走向愤世嫉俗。一方面,20世纪中后期见证大英帝国的衰落,1952年英法联军出兵埃及大败而归,使民众清醒认识到大英帝国一落千丈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20世纪中后期英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不尽如人意。二战中,英国军人主要来自中下层,二战胜利使他们相信英国的新时代就要来临,而“社会主义是关键”(Lessing 1997: 9),1945年工党领袖艾德礼当选首相,这证明民众对建设“社会主义英国”充满期待。然而,工党的福利政策、国有化政策并没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阶级结构,这令民众深感失望;加上苏联这一“真实的乌托邦”褪去光环,1956年苏共二十大报告披露斯大林所犯罪行,令很多得知真相的理想主义者精神崩溃,“干脆变成自己的对立者”(同上:

147)。绝对的热情总是伴随着绝对的愤怒:因“没有得到被许诺的”,大批理想主义者变得愤世嫉俗,“愤怒的青年”出现了,失败主义情绪笼罩着整个英国社会(潘永禄 1997:24)。每个周末,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游行常有数万人参加。莱辛也曾被归为“愤怒的青年”,也参加过游行,但只是个旁观者。在莱辛看来,愤世嫉俗是盲目乐观的结果,是理想主义硬币的另一侧面;之所以愤世嫉俗,是因为“我们身处西方文化中。我们被含蓄地或大声公开地许诺过一切。我们相信我们理应得到一切美好事物”(Lessing 1997:182)。对此,莱辛禁不住发问“谁许诺的?”(Lessing 1994:16)这体现出莱辛对西方理想主义模式的质疑。与西方理想主义许诺的美好未来相反,莱辛后期创作中不时出现人类可能遭遇的灾难,这种对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远比盲目乐观粉饰现实的“伪理想主义”更接近真实,这种对人类困境的真实关照、对人类出路的苦苦探索也远比愤世嫉俗更贴近理想主义的本义。正如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基耶罗在致贝克特的《颁奖辞》中所说“黑暗本身将成为光明,最深的阴影将是光源所在”(基耶罗 2013:324);莱辛笔下的灾难看似对人类命运的诅咒,但人类也可以“将诅咒变成葡萄园”(裘小龙 2013:220),即从灾难中有所领悟,从而更好地把握未来。

#### 4 结束语

在漫长的一生中,莱辛理想主义的内涵体现出很大变化。如果说前期莱辛像一位热情的勇士,她高举理想的火炬引领人们冲出黑暗的泥淖,奔向光明的前程;那么后期莱辛就像一位饱经风霜、冷静睿智的智者,她不断警告人们前进路上可能遭遇的挫折和危险,忧心忡忡地探索人类未来的出路。然而,不管是人类美好未来的“预言家”,还是人类灾难命运的“诅咒者”,莱辛始终关注全人类的命运,体现出对全人类的爱,所以莱辛是一以贯之的理想主义者。

#### 参考文献

董晓. 理想主义:激励与灼伤:苏联文学七十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多丽丝·莱辛. 玛莎·奎斯特[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恩格斯.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顾准.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金子筑水. 现代理想主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

卡尔·拉格纳·基耶罗. 颁奖词[A].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与获奖演说全集[C].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A].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潘永禄. “愤怒的青年”评析[A]. 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试验[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裘小龙. “把诅咒变成葡萄园”的诗歌耕耘[A].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上)[C].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谢尔·埃斯普马克. 诺贝尔文学奖内幕[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Leonard, J. The Spacing Out of Doris Lessing[J].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982(7).

Lessing, D. M. *A Ripple from the Storm* [M].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58.

Lessing, D. M. *The Four-gated City* [M].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Lessing, D. M. *Under My Skin* [M].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4.

Lessing, D. M. *In Pursuit of English* [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6.

Lessing, D. M. *Walking in the Shade: Volume II* [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7.

Linfield, S., Lessing, D. M. Against Utopia: An Interview with Doris Lessing[J]. *Salmagundi*, 2001(59).

Nelson, T. Holy Bible: New King James Version[Z].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Inc., 2009.

定稿日期:2016-06-24

【责任编辑 孙颖】